

国也是屈指可数的大财主。四平日军司令官的住宅就是他贡献的。阙朝山是阙朝玺的胞兄，曾任过旧东北军团长。任理堂是开妓馆发了财的，还有些实业家和旧官吏。成立一个四平“奉仕会”。奉仕就是服务的意思，但认为这个词还包括不过来，索性用了这个日本名词。凡参加为会员者，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野田也出席作陪并讲了话。袁厅长致欢迎词后由笔者说明了此会的重要意义。我说日本各方面的捐款名目甚多，使有钱人应接不暇。凡我会会员今后不再做其它捐款。不但如此，还可以不出较大数目的国防献金。这些人听我说有便宜可占，都喜出望外。又看省次长也参加了，都认为这个会有来历，均踊跃地解囊，一次就筹了将近5000元，在当时这个数目不算小。日本的报纸上登载了这个消息，日本人也要求参加。会长，公选赵汉宸，我任干事，现金委托省会计科代管。不久，笔者调任伪总理秘书，后事如何，不得而知。

（摘自《伪满人物》，长春市志资料选编第3辑。）

金井章次十年侵华活动述略

常德

金井章次，日本长野县上田市人，1886年生。191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医学部，同年赴英、法、德三国留学，1922年6月获医学博士。1923年3月回国，4月任大学医学教授。1924年3月任满铁地方部卫生课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为日侨在我国东北的反动团体——满洲青年联盟的理事长，曾主持该联盟积极为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武装侵略中国东北大造舆论，

极力鼓吹在中国东北建立“满蒙独立国”，要求日本政府对“满蒙”实行强硬政策。他本人则成为一名很受日本关东军首脑赏识的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九·一八”事变后，他又按照关东军的旨意，在中国东北和内蒙等地，大搞侵略活动，拼凑与控制伪政权，推行法西斯殖民政策，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少罪行。本文仅对他自1931年9月至1942年1月，这十余年间的侵略活动，作一简略的概述。

追随关东军，为建立伪满傀儡政权献策效力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为扩大侵略，筹建脱离中国本土的“满蒙”傀儡政权，大批召用满洲青年联盟、大雄峰会和满铁的人员，为其侵略活动服务。金井章次应召参加了筹建伪满各级傀儡政权的活动，并充当了很重要的角色。

第一，他参加了关东军扶持汉奸拼凑伪辽宁省傀儡政权的活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6天，即9月24日，关东军就策动汉奸袁金铠、于冲汉、闾朝玺等人，在沈阳成立了以袁为委员长，于、闾为副委员长的伪奉天地方维持委员会。两日后，关东军将其改名为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派去数名日本顾问，加以控制。其中首席顾问为金井章次，由他直接控制这个暂时的伪组织，以期代行辽宁省政府的职权。

金井章次任伪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首席顾问后，提出了建立所谓“王道政治”的主张，得到了汉奸们的赞同，遂指使汉奸为该委员会提出了用以欺骗东北人民的三项目标与三项对策。其三项目标为：（1）排除武断政治；（2）奉行民族自决主义；（3）根据民意宣布辽宁省独立，然后宣布东三省独立。其三项对策为：（1）建立满蒙各民族一体的独立国家；（2）国体采用共和制；（3）政权主体由公选委员会选定符合民意的人物。

根据上述的目标与对策，金井章次指使该委员会于9月28日与另一个伪组织——辽宁四民临时维持会一起，发表了脱离中国南京国民政府和张学良地方政权的独立宣言，并向关东军提出《确立奉天文治政体请愿书》。同时，该委员会还于9月27日组成了1000人的武装保安队，由关东军供应武器，担任沈阳城内外的警戒。

经过金井章次指使汉奸们的努力，于10月中下旬，辽宁省的财政厅、实业厅及其他各厅先后恢复工作，开始办公。同时在辽宁的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也相继开业。10月30日，金井章次拉袁金铠和他一起到关东军司令部，向关东军首脑陈述在辽宁实行“王道政治”的意见。11月7日，金井又指使伪辽宁省地方维持会发布公告，宣布将代行辽宁省政府职权。11月20日，又将辽宁省改为奉天省。

此后，由于袁金铠不同意将地方维持委员会改组成奉天省政府，关东军遂放弃拉袁，而又拉笼原辽宁省省长臧式毅出山，于12月16日成立了以汉奸臧式毅为伪省长的伪奉天省政府，同时解散了地方维持委员会。这时，金井章次则任伪奉天省政府的最高顾问，继续控制伪奉天省的实权。同时还兼任伪交通委员会的顾问。

第二，他参加了建立伪自治指导部，用以控制与夺取县级政权的活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在我国东北建立伪满傀儡政权，除利用汉奸大搞叛国独立拼凑伪省级傀儡政权之外，还极力制造“地方自治”，以控制与夺取县级政权。为此，关东军参谋长和几名参谋，纠集满洲青年联盟盟员、大雄峰会会员和满铁社员等，在一起策划设立伪自治指导部的机构。金井章次作为满洲青年联盟的理事长，伪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的顾问，是这一活动的骨干分子。10月20日，大雄峰会

的中野琥逸提出了《关于地方自治指导秘案》。10月24日，金井章次又提出了《地方自治指导部设置要领》。10月28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召集石原莞尔、花谷正等参谋和奉天特务机关长、铁路守备队长、宪兵队长、领事馆领事等开会，以上述两个方案为基础，研讨设立伪自治指导部的办法。随后，三宅光治向金井章次提出了关于地方自治的期望书，指令金井章次在伪辽宁省具体落实，抓好建立伪自治指导部的工作。金井章次则以上述两方案为基础，于11月1日制定了伪《自治指导部条例草案》，随后，又吸收了汉奸于冲汉的“绝对保境安民主义”的八条献策的内容，于11月10日正式成立了伪“辽宁省地方自治指导部”，同时制订了自治指导部的“组织条例”、“评议会章程”，并发布了伪自治指导部的“第一号布告”。伪辽宁省自治指导部部长为于冲汉，顾问为满洲青年联盟的中西敏亮和大雄峰会的中野琥逸等人，其他一些满洲青年联盟、大雄峰会及满铁社员和少数汉奸，则充当其统务课、调查课、指导部、监察部、训练部的课长、成员或派往各地控制县级政权的“自治指导员”，总人数约为220余名。

第三，他还为关东军建立伪满中央傀儡政权，实行殖民统治献计献策。其中最主要的是1931年10月24日，他向关东军司令部指出的《满蒙自由国建设纲要》。这个《纲要》是由满洲青年联盟的中西敏亮（满铁本社文书课长）和升巴仓吉（满铁社员）策划起草，由金井章次主持审定的。其主要内容有如如下6条：

（一）要领：开放门户，民族协和，排除军阀，依靠文治，从中国本土分离出来；

（二）中央：设总统、副总统，总统掌管军队，下设中央政府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下设各部门行政厅；

(三) 地方：各省设省执行委员会，各县设县长与县自治会；

(四) 地方行政宗旨：废除苛税，改善官员待遇，各民族协和，保障自由，排除军阀，人民自治；

(五) 建设步骤：由现有地方维持会任免县知事，县知事组织自治会，自治会选出代表充任省执行委员会委员，省执行委员会推选代表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决议推选总统、副总统；

(六) 特点：地方维持委员会作为临时性机关，日本人不仅充当顾问或咨议，更应作为国家的直接构成分子，参与统治。

金井提出的方案的高明之处，如以排除军阀，实行民族协和为欺骗，使“满蒙”从中国领土分离出来；日本人直接参政，充当伪政府官吏等，均为关东军采纳。这样，金井章次就为关东军筹建伪满傀儡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到1931年12月，关东军为进一步处理好建立伪满政权，实行各方面的殖民统治，又将第三课改为统治部（1932年3月改为特务部），金井章次则被吸收为关东军统治部部附，继续协助关东军，为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而献策效力。此后金井又出席了1932年3月9日的伪执政就职仪式。

充当伪满官吏，推行殖民统治政策

伪奉天省傀儡政权建立后，金井章次以首席顾问的身份，积极安排关东军派来的其他日系顾问人员，紧紧操纵与控制伪奉天省的财政、实业、治安、政法等方面以及伪奉天市的大权。并于1932年1月初，正式编成了伪靖安游击队。该队计有队员2000人，其中中国人1500名，朝鲜人450名，日本人50名，头目为日本人。伪满洲国建立后，金井章次被安排为伪奉天省的首任总务厅长。4月23日，伪奉天省政府改称伪奉天省公署，金

井正式到任，以伪满官吏的身份，按照关东军的意图与安排直接控制伪奉天省的殖民统治大权。

首先，他在伪奉天省公署各部门及伪奉天市公署，安插了一些日系官吏，掌握与控制伪奉天省及伪奉天市的各方面的权力，以推行日本的殖民统治政策。之后，他又利用原在伪自治指导部的人员，将他们分别派到伪奉天省各县，充当县参事官，控制各县的实权。1932年9月，还召开了伪奉天省各县参事官会议，交流、汇集与研究各地进行殖民统治的情况与经验，作为全省进一步加强殖民统治的参考。

其次，他又针对伪奉天省境内抗日武装力量较多较强，抗日斗争活动频繁等情况，加强了镇压力量与活动。1932年5月，在伪奉天省设立伪警务厅，随后又在各县设立与改编警务局，整顿警察队，并配置日系警务指导官予以直接控制与训练。同时，还利用已建立的伪靖安游击队，配合关东军参加了对东边道、抚顺、铁岭及辽南等地的军事讨伐活动。当年6月，将伪靖安游击队改成伪靖安军，正式编为伪满国军。之后，伪靖安军又参加了1933年春关东军对热河讨伐的后方守备工作，曾在锦州、山海关等地进行围剿抗日武装活动，同年夏，伪靖安军又到伪吉林省嫩江一带进行讨伐活动。此外，还纠集各种反动力量先后组成省、县级的清乡委员会与治安维持会，实行清查户口，收缴民间枪支等施策，以图对抗日武装与民众进行镇压与迫害，维持伪奉天省的“治安”秩序。

再次，金井章次还在控制金融、整顿币制等方面采取一些措施，为日本殖民者的经济掠夺作准备。

1934年10月，日伪在实施帝制后，为进一步加强殖民统治，对伪满行政区划进行了改组，将原4省分割为10个省（同时还原兴安3省与热河省一部划为4个兴安省）。金井章次被

调到新划分出来的伪滨江省公署任总务厅长。当年12月1日，金井就任其职，开始控制以哈尔滨为中心包括哈东与绥宁等地区的殖民统治大权。

在任期间，金井最突出的反动业绩就是极力推行“集家”政策，制造无人区，残酷地屠杀与迫害抗日武装与民众。当时，吉东绥宁和哈东等地区，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第四、第五军为抗日武装的主力，抗日游击活动相当活跃。金井章次则以抗日武装活动的中心区为重点，派遣日伪军警，强行驱赶居民，烧毁房屋，制造无人区，在另外的指定地点建立“人圈”（集团部落）。结果，使广大民众土地荒芜，财物损坏，衣食困难，劳役加重，甚至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据日伪统计，伪滨江省1935年设“人圈”246个，仅次于伪吉林省，居伪满10省的第二位，占当年10省总“人圈”数的21%，到1936年共建人圈971个，居伪满10省的第一位，占当年伪满10省总“人圈”数的30%^①。

不仅如此，为了镇压哈东的抗日武装，金井章次还召集省警务厅头目与双城、阿城、珠河、五常、宾县等五县参事官协商，由省治安维持会拨款11.9万元，于1936年5月在帽儿山成立了伪“哈东五县联合治安肃正办事处”，以伪滨江省警务厅属官野崎茂任处长，从各县分别派出25名日伪警察，计125名警察，在哈东一带进行镇压抗日武装与民众的活动。这一机构的日伪警特，还常到抗日游击区，烧毁民房，驱赶民众，制造无人区，强迫民众搬迁至远离故居的“人圈”。其中，仅在蜜蜂地区就烧房6500余间，驱赶了大批农民，并将其中35人逮捕、监禁，酷刑拷问，杀害了5人，折磨至死1人。另在平山地方捉去

^①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大讨伐”》第173页，中华书局，1991年版。

抗日武装人员5人，全部杀害^①。

此外，金井在伪滨江省任总务厅长期间，还采取一些反动措施，对一些工矿业和农业资源与物资进行了掠夺。

1936年8月，金井章次又被调任伪间岛省省长，开创了伪满政权地方机构由日本人直接当省长的先例。

到伪间岛省后，金井章次更加实力，全面推行殖民政策，不断强化对延边各族人民的政治统治、军事镇压、经济掠夺和思想奴役。他的主要反动活动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断强化各种措施，加强对抗日武装的镇压与破坏。延边地区是日伪设立“人圈”最早，警备力量最强，对民众控制最严的地区。金井到任，则继续扩大设置“人圈”的范围，以图断绝民众对抗日武装的联系。当时，设置“人圈”的重点是抗日武装活动的中心地区——汪清的罗子沟和安图的大甸子一带，此外，为防止民众掩护抗日武装人员在国境地区活动，还将与苏联较近的琿春边境的居民1375户迁入内地，安置在17个“人圈”内。

为了贯彻日伪当局的三年肃正计划，金井章次指使伪间岛省警务厅也制定了本省的三年肃正计划。要求下属警察与保甲机构与之配合，加以实施，并在一些重要地点增设治安办事处，实行特别保甲制度。此外还依靠日伪军警力量，连续不断地对抗日联军为主力的抗日武装，进行讨伐、扫荡。

（二）大搞朝鲜移民。金井在任期间，与满鲜拓殖会社密切配合，制定了1937至1939年的三年移民计划。确定每年由朝鲜向延边移民2000余户，重点为安图县，并预计到1941年时达到1.2万户。实施的结果，1937年移民2137户，其中安图县为

^①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大讨伐”》第156页，中华书局1991年版。

1 038 户，另有 1938 年的移民先遣队 195 户提前移至汪清县罗子沟^①。

(三) 掠夺森林、矿藏与农业等资源。其中，为掠夺森林资源，曾于 1937 年修筑了龙井至安图五道阳岔的森林铁路 75 公里和延吉三岔口至汪清天桥岭的森林铁路 47 公里。对延吉、龙井、和龙等地的金矿、煤矿等资源，则集中力量扩大开采。对农村，除按伪产业部规定在延吉、汪清两县设置县农事合作社外，还主动在琿春、和龙两县也设置县农事合作社，以期加强对农业资源的统制与掠夺。

(四) 强化伪协和会工作，用以加强对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年的思想奴化与毒害。

总之，由于金井章次的“尽职”、卖力，使伪间岛省殖民统治“业绩”，跃居全伪满各省之首^②。金井章次本人更得到了关东军首脑的青睐。

以最高顾问身份，控制内蒙伪政权

“七·七”事变之后，关东军对察哈尔、绥远等地进行了军事侵略。不久，便先后侵占了张家口、大同、归绥、包头等地，并相继成立了察南、晋北和蒙古联盟等三个伪自治政府。为了控制这三个伪政权，推行日本的殖民统治政策，关东军向这三个伪政权派了以金井章次为首席顾问的顾问团。

1937 年 10 月 28 日，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在归绥（今呼和浩特）成立，推云王（云瑞楚克）为主席，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为副主席，任李守信为伪蒙古军总司令，关鹤龄为伪参议会会议长。下设总务、财政、保安等三部分别由陶克陶、吉尔嘎

^① 《满洲国现势》，康德 5 年版第 189 页。

^② 《满洲国现势》康德 4 年版第 179 页。

朗、特克希卜彦任部长。另有日本人顾问团，首席顾问金井章次，次席顾问宇山兵士，总务、财政、保安三部的顾问分别为中岛万藏、栉部正晖和大园长喜。金井章次虽为首席顾问，但未到职，由次席顾问宇山兵士代行职权。而金井章次这时却在张家口，为筹建伪“蒙疆联合委员会”而积极活动。

建立伪蒙疆联合委员会，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上述三个伪政权的控制，以便掌握平绥线地区的经济命脉，掠夺战略物资。经过金井章次的胁诱，于当年11月22日，由蒙古联盟、察南、晋北三个伪政权的代表协商缔结了9条协定，正式成立了伪“蒙疆联合委员会”。金井章次任该委员会最高顾问并代理总务委员长职务，可以“总理并代表联合委员会”独揽其大权。任命日人村谷彦治郎为参议，三个伪政权的代表等为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分管总务、产业、金融、交通等事项。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三个伪政权的控制，金井章次于1938年8月1日，对伪蒙疆联合委员会进行了机构改组，将总务委员会及产业、金融、交通等几个专门委员会改为总务、产业、财政、保安、民生、交通等6个部，除利用5名蒙古族人当部长（其中一个兼任民生、交通两部长）外，还派任了8名日本人顾问（其中产业、财政两部各派两名日本人顾问）。经过这样一改组，强化与扩大了伪蒙疆联合委员会的组织与职权，使之由协商机构变成了行政机构，组织范围也由代管产业、金融、交通，扩大到管理民政、保安等事务，实际上成了伪蒙古联盟、察南、晋北三个伪政权的太上机关。

1938年秋，根据日本军部决定，由金井章次陪同已升任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主席的德王及李守信等进行访日。在德王等人与日本政界、军界首脑接见时，金井则形影不离，并对德王所讲的“蒙古”一词，都一一加以反对和限制，都要求改为

“蒙疆”一词。甚至以杀头来恫吓德王的翻译，不准将“蒙古”二字译成日语，只许译成“蒙疆”。

对金井的专横跋扈，德王等人很反感，访日回内蒙后，德王曾联合各盟盟长共同提出反对“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公文。金井和日方其他参谋，则以总务委员长的职务胁诱德王，并指使伪官吏李守信、陶克陶等规劝德王认清“胳膊扭不过大腿”的形势，使德王就范，于1939年4月29日任命德王为伪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总务委员长。此后，又在金井章次的操纵下，经过几个月的准备，以伪蒙疆联合委员会为基础，将伪蒙古联盟、察南、晋北三个伪政权合并，于当年9月1日在张家口成立了以德王为主席，以于品卿、夏恭为副主席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金井章次继续担任该政府的最高顾问。

金井章次任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顾问后，首先将一批日本人分别安排为伪参议府秘书处、政务院的总务部长及民政、治安、司法、财政、产业、交通等部次长，使日本人控制伪参议府及政务院各部的实权。并制定了《组织大纲》与《施政纲领》。随即按照日本殖民者的意图，推行殖民统治政策，进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治统治、军事镇压、经济掠夺和思想奴化。

在军政方面，除驻有大批日军外，利用日伪军警宪特监视人民，欺压百姓，刁难商旅，甚至奸淫妇女，无恶不做。例如，有一次一名日本警察在巴彦塔拉盟以搜查户口为名，闯入民宅，调戏侮辱几名妇女。当德王将此事告诉给金井章次时，金井当面答应追查，但却包庇不管。几天后金井则向德王说：“这个人已经应征入伍，无法追查了。”再如，1939年冬，傅作义军反攻包头，使日伪军损失很大，包头几乎失守。事后，日本“南支那”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视察时，金井章次则推卸责任，诬称伪内蒙军中有人向敌军提供了情报。最后“追查”到包头市

公署职员王文治身上，并使包头各界人士多人遭受株连。

在民族统治方面，名义上标榜“民族协和”，实则推行日本人为主人，其他民族为奴隶的民族压迫政策，并在蒙、汉、回等民族间造谣生事，挑拨离间，制造隔阂，以期互相牵扯，为其利用。

在经济方面，则在蒙疆地区设立一些特殊会社，控制金融、煤炭、交通、电业等部门，进行经济掠夺，并利用贩卖烟毒，开设赌场等来搜刮与毒害民众。

在文化方面，金井和其他日本殖民者一起，以宣扬“日蒙亲善”、“民族协和”、“发扬东亚道义精神”和普及日语教学，限制学习蒙文与汉文等方法，来实行奴化教育与同化活动。并在这里设置学校、养成所，建立兴亚团体，用以向蒙汉等民族灌输奴化思想。

此外，金井还积极安排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与汪伪政府加强联系，并于1941年2月，再次陪同德王访日，以增进日蒙亲善关系。到1942年1月，金井章次被调离内蒙。

总之，金井章次在内蒙的4年零4个月期间，以最高顾问的身份，忠实地贯彻了日本侵略者的殖民侵略意图，以阴险狡猾的手段，千方百计地控制内蒙伪政权，时刻注意防止其脱离日本的独立倾向，以期使之成为日本殖民者的驯服的傀儡与工具。因此，金井在内蒙也同他在东北一样，干了许多残害中国人民的罪恶勾当。从这些罪恶活动来看，他确实不愧为一名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